

● 世界历史

1890—1894 年德国远东政策的挑战与构想

王 飞 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飞麟(1974-),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德国史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摘 要] 1890—1894 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分野。此时, 俾斯麦的政治遗痕逐渐被德皇的扩张战略所冲刷。而以中日矛盾的不断升级为主线的远东事务则为第二帝国提供了一个能表明自身对外政策变化的舞台, 从而使得德意志在远东的举动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能初步体现出德国世界政策的轮廓, 并凸显出了这一时期在第二帝国外交史上的承启性。

[关键词] 德国; 远东; 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 K51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584-05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幸运的, 身处纷繁错杂的欧洲, 居然能一跃从分裂走向统一, 从虚弱走向强悍。然而, 第二帝国在其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的扩张活动中, 由于国内外矛盾使其不得不时时掣肘于诸多羁绊。1890—1894 年, 德国为谋求向世界扩张, 在执行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实施其远东的战略构想时, 就遭遇到了阻力与挑战。但这一时期是第二帝国外交发展历程的重要阶段, 它为一战中德国远东战略地位的成型作了铺垫, 同时也预示了第二帝国的历史归宿。

一、变化中的机遇

歌德曾说, “日耳曼人事事都要引起麻烦, 于人于己都是如此”^[1] (第 3 页)。这句话若是用来描述德国历史上诸次内政与外交的重大事变及其影响可谓毫厘不爽。19 世纪 90 年代是诸强争霸、合取余羹的时期。而业已完成统一, 并且工商、外贸、交通、科技迅速发展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更是必然会将自身的物质与文化繁荣彰显于外部空间的展拓。

1890 年, 德国国内的政治重组, 其根源肇始于“老船长交班”。宰相俾斯麦于 1862 年宪政危机时, 即操运“德意志号”这艘欧洲巨舰, 近 30 年来他专注于自身的统一与强固, 致力于社会的安定与平稳。但而今, 俾斯麦对于各方, 尤其是以威廉二世为首的殖民势力而言, 实在乏善可陈。而且, 普法战后迅猛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再难以迁就于俾斯麦的旧制了。同时, 第二帝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陡然呈现在 19 世纪末的世界事务中, 它目视着自己并不熟知的国际格局, 新奇而躁动。那么, 这一时期德意志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呢? 试看下表。

1. 重工业品的产量(单位: 百万吨)

煤			钢		
年份	德国	英国	年份	德国	英国
1871	37.7	119.2	1871	0.14	0.41
1880	59.1	149.3	1880	0.69	1.32
1890	89.1	184.5	1890	2.13	3.64

2. 收支平衡状况(单位: 百万马克)

从以上数字可粗略看出, 到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在工业及对外贸易方面比普法战后初期取得了长足进展, 而这种物

质力量的快速堆垒又为德国内政状况的更易提供了条件。

年份	进口	出口	结余
1880	2,814	2,923	+109
1890	4,162	3,335	-827

注：资料来源见^[2]（P.11）。

威廉二世的近臣马沙尔(Maschall)曾写道,威廉是一个令人目眩的角色,他明晰自己的能力并试图努力而精细地将自己的才能展现到至极^[3]（P.8）。但通过以上所列情况可清楚地看出,这位新德皇与那位“老船长”是存在冲突的。这正如M·迪尔所说,两人的性格差异是德意志两代人的差异,一个年轻、活跃、急于表现;而另一个则老迈、保守、思维停滞^[4]（P.192）。通过以上数据可知,他们的不睦并非全由性格使然,而是第二帝国迅速膨胀的财富及其相应的难以平复的欲望使得他们及其所代表的积极与保守的两种势力不能在德国政治生活中融洽共处。而这种矛盾则直接体现在第二帝国外部政策的变动上。R·L·卡利指出,国家间力量消长的关键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变化国际体系的成本与代价,因而更改国际体系的刺激也就不同了。同样,随着国家力量的增长,在既定体系中寻求变化的愿望的可能性也随之增长^[5]（P.24）。因而德国力量的变化是促成其对外政策更易的决定因素。而在由物质及文化繁荣引发的对外部开拓的饥渴中,德意志感受到了一种亟须平抚的缺失。它急于非欧洲地区版图的日渐“缩水”,以及自身虽有巨大工业潜力而无相应市场与之匹配。

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势力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长足发展,德意志工业经济特殊的适应力使其能在半封建、容克、保守及用以粉饰门面的议会民主环境中逐渐擎得欧洲繁荣的领旗。同时,19世纪以来德国工业的发展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各阶层、各集团在政治舞台上也尽力赢得最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美国政治学者J·哈塞尼伊曾说,对于政治变化的解释只能从不同集团的力量制衡方面出发,这些集团也正急于求得最有利于其自身的某种安排^[6]（P.136—145）。这种变化在政治上的直接表现是卡普里维所代表的新型政治集团的继任。卡普里维(1831—1899)1849年入伍,1883年任海军大臣。由于其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并与任何党派无联系,因而被俾斯麦选为继承人,1890年3月任普鲁士总理、外交大臣^[7]（P.855）。他虽为俾斯麦所指定,而且他也预料到俾斯麦的首任继承人必定失败,但他接受了重任,因为他觉得这是其职责所在^[8]（P.29）。卡普里维的使命感使他一上任便显露出有别于其前任的新气象。他除了借助议会中的党派支持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军事、教育改革外,还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行动。1890年7月,他与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达成一项旨在划分英德在东非及尼日利亚势力范围的协定,它规定德国从桑给巴尔撤军以换取北海上的赫尔果兰岛。这虽与始自80年代的非洲开拓计划相左,但这首开英德接近之先,是挣开法俄巨钳的重大尝试。卡普里维还简化了俾斯麦时期繁复细密的外交路线,并在俄奥间作出了果断抉择,回避了要同时拉拢在巴尔干问题上水火不容的俄奥的难题。卡普里维时期对外政策的新变化又并非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完全否定,它不能被全盘抽离出后者的体系构筑。因为俾斯麦外交是基于当时具体环境的,它固然有其主观性,但毕竟为第二帝国赢得了自身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故而俾斯麦外交的既得成果与其在90年代的适时退出为随后的继任者们提供了新的机遇。

德国外交在后俾斯麦时期的路径取舍与框架构建则是基于这位昔日“老船长”作品之上的修葺与延伸。它可以按照当前情形执行更能与德意志总体发展相合拍的方略。1890—1894年,即卡普里维主持内政与外交的4年间,德国外交仍趋于内敛,而且只是对七八十年代大陆政策的某种总结与调整,但如果联系到此后直至一战爆发前夜的历史时段,卡普里维时期又应是俾斯麦大陆政策到提尔皮茨——比洛世界政策的合理过渡。所谓合理,即是俾斯麦对外政策的巨大惯性,须得一段时间才能加以克服与转换。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虽然这一时期依旧留有大陆政策的影响,但第二帝国毕竟在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寻得了机遇,这种机遇是由巨大的物质力量、有利的战略地位、俾斯麦留下的内政空间及其他连带作用所形成的。

二、远东的危情

随着威廉二世“世界政策”渐露锋芒,第二帝国在俾斯麦时期就已在非洲、近东及远东显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得以伸展与强化。远东的中国便成了这种伸展与强化的矛头所向。齐波拉指出,帝国并非存在于一个真空之内,它们往往被某些国家包围,这些国家总以种种方式从帝国那里获得益处^[9]（P.56）。这个论断较为适用于晚清的中国。清廷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国势日衰,而英法俄等国在满清仍踟躅于封建王权的藩篱时,不仅逐步蚕食中国周边地区,而且也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后,1868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创了从东方专制君主国向现代工业强国过渡的先例。国内市场狭小,原始积累不足的弊端使它将东方尚徘徊于现代化道路之外的蒙、韩、中列为其征伐的首要目标。

故而,当俾斯麦忙于国内的反天主教分裂势力的文化斗争、反社会主义的相关举措与欧陆的反法体系的促成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饕餮饱食的英法美俄加上磨刀霍霍的日本却在远东形成了全面进攻的态势。当卡普里维将这个长久以来曾自顾不暇的中欧强国的视野瞄向东方时,列强在华的争夺便已经在中国的藩属朝鲜展开了。

日本政界群僚的大多数意见认为,朝鲜的安全存在是日本安全的保证。其中一名政客竟称,朝鲜如果被对日本不友好的国家掌握,那么它就是“一柄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因而日本同时具有仇华与惧俄情绪^[10](P.172)。所以,它积极在汉城设法削弱中国清廷对朝鲜的宗藩关系。但李鸿章于 1879 年对一位朝鲜官员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之策,抵制日本诡计的惟一办法就是与西方各国缔结条约。”^[11](第 10 页)于是,朝鲜便在 1882—1886 年间分别与美、英、德、法、意、俄签订条约。李鸿章这一套制日的对策使得原属中华帝国系统的朝鲜的政治前途国际化。德国介入远东事务也就有了可能。

对于朝鲜事务,德国早在北德意志联邦时期就已涉入,但这种涉入却因为其远东政策的未定以及无条约化的保障而表现为一种试探。到了 80 年代,尤其是 1882 年朝鲜发生了反亲日的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以及上述的德朝订约之后,德国才乘机介入其间。李鸿章的决定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他在以袁世凯为驻汉城商务总办的同时,又择定了德国人穆麟德(M. Hendorff)为韩王身边的外国顾问。此人在 1883 年春季到达朝鲜,李鸿章期望能够凭着他的进言献策使大局按照中国的利益去发展,并且维持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承认^[11](第 11 页)。尽管穆麟德的具体措施因缺少来自紫禁城的财政支持而举步维艰,但他的举动及其作用表明了德国外交地位在李鸿章等清廷重臣心目中的提升。1884 年 12 月甲申政变后,中国日益受到日本的进逼。穆麟德又于此时与俄国商定,促使俄国借调军官给朝鲜以加强其军事训练,并劝诱朝鲜联俄,1884 年俄韩订约,穆麟德因促成之功,被俄皇赐以勋章^[12](第 253 页)。因而可知,即便德国在俾斯麦时期没有直接以军事人员投入中国与朝鲜危机,但针对日本在远东的崛起与扩张,德国一开始就将俄国作为其在远东的利益伙伴,同时又力图使俄国陷足于远东纠葛,减弱法俄联合的危险。

卡普里维主政后,德国外交局面发生了变化。在远东,它由迂回试探转变为积极穿梭。这很快在中日战争中体现出来。德国对这场战争密切关注,其参谋本部最初还认为清廷军事力量也不能算弱,当中日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因而,日本不能取胜^[13](P.162)。但清军在湘淮两系腐朽习气充斥之下,节节败退。西方对日本的冒进是呈抵触态度的,在牙山开战后不到 3 个月,即 1894 年 10 月 7 日,英国驻德大使马来特(E. Malet)照会马沙尔:本大臣奉大英帝国女皇陛下外交大臣之命,请求贵大臣或帝国政府,与英、法、俄、美 4 国,在赔偿日本兵费,及由列强保证朝鲜独立之基础条件下,共同干涉中日战争^[14](P.243)。由此可知,推行均势外交而素与德国若即若离的英国也因感到日本对其在华利益的威迫,而觉得与德国有联络的必要。但德方的反应较冷静,这点可从马沙尔在 10 月 9 日的记录中看到,“我说,首先应提出的问题是干涉的军事局面,它(指日本)的拒绝可能视为肯定的,所以这个问题更加需要澄清。我又希望知道其次有关国家,即俄国对于打算初步干涉的态度。”^[14](P.244)德国方面的考虑因素有 3 条:1. 日本在未达到既定目标前,不会接受调停建议;2. 俄国的态度如何;3. 德国欲扩大在华势力范围,若清廷让步愈多,则它摄取愈丰。在日本海陆军事行动未完之前,中国是不会自动放弃已遭蚕食的主权的。故而德国不仅置英国的要求不顾,还在此后屡次拒绝中国公使的调停请求。随后,英国也并未积极力求干预,那么英国既是建议联合干预,为何在德国反应冷淡后,也搁置了这种方案呢?笔者认为,英国的均势外交不仅仅表现于欧洲,而且也延续到远东。20 世纪,温斯顿·丘吉尔曾明确地将均势政策表达为英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四百年来,英国外交一直就反对大陆上最强、最具侵略性、最霸气的国家……如果同强国站在一边,并分享征服后的果实,这既容易又挺诱人。然而,我们却总是采取强硬政策,联合较弱的国家击败大陆上的任何军事暴君。”^[15](P.109)此处的大陆虽指欧陆,但英国外交的这种特征却早已远远拓伸到其他地域。英国始则反对日本冒进,力主联合干预,继则态度冷淡,虑及俄国在华势力的南下危险,英国反倒冀图日本的加入以对俄国构成某种程度的阻遏。同时,英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手段,力图使自己对日本的支持不致造成英俄的对抗。同时,它还通过松动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来改善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俄英的紧张关系。这种英俄和解的迹象将预示着俄国在近东战略地位的增强,这不言而喻地威胁到德奥在巴尔干与土耳其的利益。另外,英国可能在亚洲自由行动并占领上海等要地,这又将影响到德国在华势力的稳固,这种担忧困扰着威廉皇帝^[14](P.246)。

通过对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远东政策的回顾可知,德国在远东地区的首要目的是获得利益,其次是诱俄东进。但日本的进逼以及英俄的缓和使得德国的远东构想面临挑战,对此德国只能作出有效应对。

三、挑战与构想

针对以上所述英俄有可能对华的协作及日本对辽东的进袭,德国方面体现出来的是急切与焦虑。德国在华的虚弱

形象更加剧了这种情绪,因为尽管德国在欧洲取得了1864—1870年的军事胜利,但在北京眼中,德国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16](第84页)。其在华商务虽也不断拓展,但清廷外交当局的思维定式依旧留连于咸丰、同治间。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德国在华的经济与政治要求得不到清廷给予美、英、法、俄类似要求的尊重。威廉二世于1894年11月17日致函霍亨洛埃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因此而受损失,或受人惊吓。我们在亚洲也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营业每年值四亿马克。”^[14](P.246)威廉皇帝进而提议台湾作为这个据点,并征询马沙尔的意见,马沙尔的判断与皇帝相左,他认为英俄和解是依据不足的,同时有鉴于自己在远东巨大的利益,英国舰队在远东地区的调用是可以理解的,而英国一向反对瓜分中国,同时又把它视为印度的缓冲国,如果英国兼并中国领土,将难以保证法俄不效法,马沙尔对远东局势的分析是较为客观的。这多少避免了德国对瞬息万变的远东外交局面的应对的仓促性。德国也认识到,在战争结束时,有种种榨取中国领土的可能。它不赞成在这个时候瓜分中国,因为它所得到的份额将是很少的。它的政策是:保持行动的自由并等待英俄两国竞争与猜忌的发展^[17](第56页)。

随着清军在辽东的败绩愈来愈明显,一度对联合干预表示冷淡的德国也逐渐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着自己的外交策略。德国人知道,在远东局面由于中日战争结束而亟待重整的时刻,如果继续没有可靠据点而仅附着于拥有对华政策连续性的英俄等国,将对德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形成他们所不愿接受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清廷承认德国在调处中不断获得增长的威望,另一方面又由于德国在华无固定势力范围,这种威望又不断因缺乏陆基上的积淀而消失。

现在来分析一下其余国家的态度。最先染指中国的英国的态度是未定的,它既希望新兴的日本对远东压力的施加能给予俄国一个来自于东方的掣肘,又不愿日本在此处信马由缰,恣意搅乱本已稳固的远东局势。英国企图将日本发展成一个能为其所用的远东战略工具。对此,S·吉法德曾说,到20世纪初,日本甚至被认为是足够的文明,军事上足够的强大,它因而可以被接受为英国的盟友了(指1902年英日同盟,笔者注)——这是自欧陆19世纪70年代纷纷建立联盟战略以来,英国政府所订立的首项协定^[18](P.51)。那么,中日战争时英国所持的态度自然应是这种同盟构想的准备。而对于法国,在面临东邻的挑战下,满怀1870年仇怨的它在欧洲日渐向俄国靠拢。自拿破仑战争到维也纳会议,一直反法的俄国,对比法德两国对俄关系的差异,也逐渐冰释了法俄间的矛盾。因而,两国的接近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体现与巩固。

1894年的中日战争爆发之时,德国的外交姿态是若明若暗的,出于获取实利的目的与期望,在英国躁动与法俄的默契之间表现出初期的迟滞,即便是德皇偶因局势的骤变而丧失冷静,其外交部官僚合理而仔细的推论很快又使德国在开战初期保持了外交上的独立。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物质力量雄厚,藉它急切希望得到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与殖民地利益。故而德国的举动是在审慎中进行调整,并非被动地等待。它一面筹备着一次在现行国际关系下将难以避免的大战,一面则不断在对外事务中逡巡于战争边缘,即使是在天高路远、利益甚微的远东,德国也摆出一副进攻态势。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余诸强反应各异,而这种反应又多少决定了战略结盟不仅是欧洲复杂地缘环境下的产物,它也因为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日趋激烈而演化出它的远东翻版。因德国远东外交的具体实施,法俄在远东也就寻得了更多契合点,英日也显露结盟态势,尽管在1894年英国对日态度徘徊未定,但对俄德的疑惧终使其接近日本。这样,德国在远东所面临的挑战较之欧洲更加严峻。在欧洲,文化、地缘及历史上与德国密切相联的奥匈对德国在政治上与战略上的支持是巨大的,同时在欧陆经营多年的德国对欧洲问题更是驾轻就熟。而在远东,空间上的跨度使得尚待加强的德国海军鞭长莫及。正因如此,德国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表现出敌对之时,它也只是联合在此处已有传统利益的俄国,而非独立采取若干对策。

德国作为后起的殖民国家,海上力量尚弱,故而在推行其“世界政策”中,必然要遭遇到许多阻碍。况且远东在地理上的阻隔就更使得德国在执行对该地区的扩张构想时不能不作出特殊的应对举措。这一时期的远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为德国在一战中远东的战略地位的成型作了铺垫。随着以后英日结盟与法俄的合作,德国在远东并无稳妥可靠的联盟保障,而英国舰队在北海的压力,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德国海上力量在回缩的同时无力兼顾远东及太平洋,其世界政策也就失去了执行的物质力量。这两种情况使得德国外交路线变得异常错综而崎岖,虽在局部也不乏成功之笔,但在总体上,争夺世界霸权的欲望则使任何人为的努力在客观事实面前变得无措。故而第二帝国的历史归宿在1890年即已设定,因为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谋求霸权与控制令德国自身的物质力量难堪其负,而国家政策包括外交方针的重新规划就只有待到第二帝国终结之日了。

[参 考 文 献]

[1] 郭少棠. 德国现代化新论——权力与自由[M].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

[2] LAYTON, Geoff.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M].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 [3] Trützschler, Graf Zedlitz. Zwölf Jahre am deutschen Kaiserhof[M] . Berlin: 1924.
- [4] DILL, Marshall. Germany: a modern history[M] .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 [5] CURRY, R. L. Jr. and Wade, L. L. Theory of Political Exchange —Economic Reasoning in Political Analysis[M] . Engel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8.
- [6] HARSANYI, John. Explanation and Comparative Dynamics in Social Science[J \] Behavioral Science, 1960, (5): 136-145.
- [7]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IV[Z] .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64.
- [8] NICOLS, Alden. Germany after Bismarck: The Caprivi Era 1890-1894[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9] CIPOLLA, Carlo M.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 . London: Methuen, 1970.
- [10] NAHM, Andrew C. . Kore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a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M] . Elizabeth, N. J.: Hollym International Corp, 1988.
- [11] [美]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2 卷[M] . 张汇文, 等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12]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M] . 台北: 台北南天书局, 1994.
- [13] RAWLINSON, John L. . China' 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M]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4]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Vol. IX[D] . Berlin: 1921.
- [15] WALT, Stephen M. Alliances: Balancing and Bandwaggoning [M] . New York: arper Collias, 1996.
- [16] [法] 施阿兰. 使华记[M] . 袁传璋, 郑永慧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17] [英] 菲利浦·约瑟夫. 列强对华外交(1890-1894)——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M] . 胡滨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18] WILLIE, Thompson. Global Expansio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1870-1914[M] .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German Far Eastern Policy in 1890—1894: Fabrication and Challenge

WANG Fe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Fei-lin (1974-),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erman history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1890 to 1894 i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fo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2nd German Reich. By then the Bismarckian political vestiges had been gradually flushed away by Kaiser's expansive strategy. Motivated by the escalating Sino-Japanese contradiction, the Far Eastern affairs offered a stage on which for Germany to display the alterations of its foreign policy, which made Germany's motions and the pending challenges embody the rudimentary profile of its "World Policy", and made salient the successiveness and initiativeness of the period in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2nd Reich.

Key words: Germany; Far East; foreign policy